

《新中华报》 在党的理论建设中的历史作用探析

孙洋洋 金民卿

【摘要】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向已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新中华报》提出在服务抗战大局的宣传工作中强化理论内核、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要求,为《新中华报》参与党的理论建设指明了方向,即以“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运动”。该报通过丰富有效的宣传实践,在党的理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多维发力,促进理论传播;积极斗争,推动理论建构;深入实践,丰富理论内涵。《新中华报》致力于党的理论创新和传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统一于中国革命实践,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丰富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并对新时代协同推进主流媒体建设、党的理论建设以及宣传思想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新中华报》 党的理论建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者简介】孙洋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求是杂志社秘书处干部;

金民卿,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21)04-0015-11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是我们党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宝贵经验,而党的理论之所以能够掌握群众、深入实践并实现自身的创新发展,离不开中共中央机关报这一重要宣传媒介。从“同人办报”到“党之喉舌”,中共中央机关报作为党开展宣传思想工作的主阵地,通过理论的宣传阐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真理力量,使党的理论在与各种思想的交流交锋中始终牢牢占据制高点,不断推动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共同发展。正如蔡和森在评价党的历史发展时说:“政治机关报的创办,是中共由初创时鼓吹主义的宣传团体走上政治舞台,是宣传和实现党的革命理论和策略的舆论前驱。”^①因此,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中中共中央机关报对党的理论建设的作用,有利于我们从历史长河中感知历史脉搏、探索理论发展规律,在理论逻辑、

^① 郑保卫:《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中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为在当代协同推进主流媒体建设、党的理论建设以及宣传思想工作汲取历史养分。

1937年1月29日，《新中华报》作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在延安编辑出版，后随着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改为政府机关报。1939年2月7日，《新中华报》新刊^①第1号问世，标志着该报正式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兼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也即党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份中央党报，并在改组一周年之际被毛泽东称赞为“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②后于1941年5月终刊，与《今日新闻》合并为《解放日报》，累计出刊230期。^③该报作为中央党报虽不足三年，却“在全国享有最大的权威，在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派，巩固团结反对摩擦，主张进步反对倒退的斗争中，尽了一切的努力”，^④也在这些丰富有效的宣传实践中对党的理论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创新方式方法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积极开展斗争以捍卫马克思主义阵地，密切结合实践来推动理论创新发展，成为党宣传、阐释和建构科学理论的重要载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次提出的背景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也为党的七大时毛泽东思想被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舆论基础。该报被党内多位领导同志誉为“民族喉舌”“解放灯塔”“抗日先锋”等，更有延安民众为其题词：“马列主义斗争的方向，就是新中华报斗争的方向。”^⑤关于该报的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其历史沿革以及对抗战动员、边区建设等实践的影响，鲜有从党的理论建设角度对其进行发掘。本文试图透过该报的历史文本，在考察和梳理其理论建设具体实践的基础上，系统论述其在党的理论建设中的作用，以期深化相关理论研究。

一、《新中华报》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

《新中华报》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被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其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也随着其身份定位的转变发生了变革，正如它改组后的首篇社论所言：“新中华报改革于抗战走上新阶段的今日，本着中共中央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长期合作，以便在持久抗战中争取最后胜利的基本方针，本着言论机关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应尽天职……改革后的新中华报的政治责任是更加严重了。”^⑥因此，要考察该报的宣传实践及其在党的理论建设中的作用，必先对其改组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因素进行考量，并深刻把握我们党以该报推动理论建设的现实需要。

（一）就外部环境而言，是党在应对不利局面中阐明理论观点的需要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对国民党施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并转移主力来打击共产党，力图分裂国共合作。在这种背景下，汪精卫公开卖国乞降，蒋介石虽留在抗日阵营，但由于日本的诱降、英美的绥靖主义政策以及对“共党乘机扩张势力”的担忧，其反共倾向日益明显。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在会后秘密发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等文件，各地反共摩擦日趋严重。国民党顽固派在军事进攻共产党的同时，也在政治思想上以宣传手段发起攻势。^⑦一批反动文人、托派分子和叛徒纷纷鼓噪附和，以所谓“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以民族斗争旗号反对阶级斗争，以法西斯式的“统一”反对人民的统一。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勱公开致信毛泽东，要求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叫嚣“窃以为目前阶段中，先生等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

① 《纪念本报新刊两周年》，《新中华报》1941年2月6日。

② 毛泽东：《强调团结与进步》，《新中华报》1940年2月7日。

③ 参见钱承军：《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报刊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

④ 凯丰：《新中华报的两周年》，《新中华报》1941年2月6日。

⑤ 《延安民众教育馆祝词》，《新中华报》1940年2月17日。

⑥ 《新中华报改革的意义》，《新中华报》1939年2月7日。

⑦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06页。

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① 这些披着理论外衣的反共言论让民众深受迷惑，对抗战前途和国家未来命运深感忧虑。现实表明，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中国革命走什么路、中国向何处去等一系列问题，已随着革命进程的推进、政治局势的演变被尖锐提出，并亟待回答。面对如此之外部环境，中国共产党这支重要抗日力量必须借助其机关报这一重要宣传媒介，旗帜鲜明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宣传自己的主张，阐明自己的理论。

（二）就自身建设而言，是党在发展壮大中强化理论支撑的需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日大旗，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深入开展游击战争，广泛创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在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下不断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在陕甘宁边区，我们党以“实施抗战建国纲领、实行三民主义的模范”为建设目标，大力发展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带动了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也为党中央创造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在全国范围内，根据1938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各地各级党组织不断扩大社会基础和组织范围，使党员队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② 此外，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随着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的不断加强，中国共产党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广泛群众基础的全国性大党，其理论纲领和政治主张也愈发受到外界关注。与此同时，党员数量大幅增长带来的党员成分、思想状况复杂化问题，以及党内思想清算的经验教训，也使党中央愈发认识到做好理论宣传、廓清思想迷雾的重要性。由此，在相对稳定的陕甘宁边区创办一份全国性的党报，用以传达方针政策、助推理论建设，已经具备了现实上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三）就宣传工作而言，是党在宣传鼓动中明确理论导向的需要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结合党内外形势变化特点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提出“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的总方针，强调必须动员报纸刊物“向前线官兵、后方守备部队、沦陷区人民、全国民众，作广大之宣传鼓动，坚定地有计划地执行这一方针，主张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清洗悲观情绪……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用以达到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目的”，^③ 为这一时期党的宣传工作明确了唤起民众、团结抗日、争取胜利的任务目标。而后，他又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④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⑤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在此正式出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和思考发生了重大飞跃，也在层层递进的逻辑下为党实现宣传工作的目标明确了理论导向：报纸刊物要取得以宣传鼓动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实效，就要在宣传工作中注重发挥和彰显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注重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综上所述，《新中华报》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伊始，便面临着实践和理论上的双重发展需要：实践层面上，在宣传实践中强化理论内核，以阐明我之主义，打击敌之谬论，加强思想统一，巩固党的建设，建构革命话语，唤起民众抗日，争取革命胜利；理论层面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命题首次提出的背景下，进一步明确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并在办报过程中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

① 转引自李永进：《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研究》，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135页。

② 参见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延安时期大事记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116页。

③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10~61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理论传播和中国化的互动中推动党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发展。^①这两方面在本质上是相同历史任务在具体和抽象层面的不同体现，并统一于中国革命实践，从而为该报参与党的理论建设明确了方向——以“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运动”。这一点在该报改组后中共中央和中宣部发布的宣传工作文件中不断得到明确，如中共中央于1939年5月17日发布的《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坚持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②1941年6月20日发布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明确了“我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原则”，^③任务在于“宣传党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党的纲领与主张，党的战略与策略，在思想意识上动员全民族与全国人民为革命在一定阶段内的彻底胜利而奋斗。这种宣传与鼓动，同时包含有对共同思想进行联合，对敌对思想进行斗争的两个方面”。^④

二、《新中华报》推动党的理论建设的具体实践

《新中华报》改组以后，在已有组织形式和办报实践的基础上，对自身的中央党报定位和言论机关职责有了新的认知，开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党的领导为前提，以宣传为本位，以联系群众、推动实践为着力点的实践活动。^⑤“表现在代表中共中央政策主张等社论专论之增多，表现在国内国外重要新闻的增加，表现在对全国军民的英勇抗战业绩更广泛的表扬，表现在对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抗战经验更有系统的介绍，表现在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方面生活更有系统的反映”，^⑥密切联系群众和实践，立足于党的工作全局不断发展“宣传”功能，对促进党的理论传播、建构和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深化学习研究和宣传阐释，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

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并为党员群众所接受，是党的理论建设的首要环节。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深刻总结建党以来正反两方面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⑦和“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⑧是全党的两大任务。《新中华报》改组以后，切实改变以往直接译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方式，开始尝试从多个维度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和深化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第一，以代表性人物和事件为切入点介绍马克思主义。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重要贡献的代表性人物是推动理论发展的关键主体，苏联历史和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现实体现，以此为标识介绍马克思主义，有利于读者通过具象的人物和鲜活的事例来理解抽象理论的“所以然”，培育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感情，从而更加接受和信服马克思主义，故《新中华报》以此为切入点，刊登了大量纪念类和评传类文章。在斯大林六十诞辰之际，该报通过刊发多位中央领导同志祝词，全面介绍了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承继和发展，涉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问题、民族问题、党员干部问题等多方面。^⑨在李大钊同志殉难十四周年之际，该报专设纪念特刊，以一组文章详述了这位革命先驱是如何在中国播下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如何为共产主义信仰

① 参见王刚、徐晓光：《中国共产党百年史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思想理论教育》2021年第4期，第20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页。

③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3页。

④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第422页。

⑤ 参见王晓梅：《变迁中发展的〈新中华报〉》，《新闻大学》2008年第4期，第81页。

⑥ 《新中华报改革的意义》，《新中华报》1939年2月7日。

⑦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⑨ 《斯大林六十诞辰本市举行盛大庆祝会 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亲临演讲》，《新中华报》1939年12月27日。

英勇牺牲的。^①此外，在苏联第三个五年计划提纲发布时，该报转载塔斯社电讯《苏联发表第三次五年计划提纲》全文，并配以张闻天的祝词，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实践展现了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以及向共产主义阶段迈进的现实可能，用事实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改造现实的科学性。

第二，以党的领袖人物和先进知识分子为主体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党的领袖人物和先进知识分子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关键主体，他们有着丰富的理论素养和革命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更能保证理论的彻底性、逻辑的严密性和表达的通俗性，从而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作为《新中华报》的主要作者群，党的领袖人物和先进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穿于对时局和国情、历史与当下的考察之中，把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寓于相关时评和政论之中，是立足中国实际学习“本本”的良好示范。毛泽东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②在分析帝国主义战争的原因、目的、性质、特点和前途时，阐述了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学说。艾思奇在论述“五四运动”的当代价值时，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民族文化的内在一致性，提出“五四运动培养出来的最大的两株文化树，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发展了的三民主义”。^③1940年6月，《新中华报》对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的召开进行了详细报道，介绍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部分哲学成果及其现实价值，解读了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艾思奇等同志讲话中关于哲学研究现存问题、发展方向和具体任务的看法，强调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推进哲学研究的重要性，有利于以哲学研究为着力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发展。

第三，以推动理论学习为抓手加强党员干部的理论武装。强化理论学习是改造“农民党”、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推进思想建党的的重要途径，也是以集中有效的理论输入推动理论传播的过程。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了理论学习对于革命胜利的重要性，并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竞赛的号召。会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组织理论学习，并在延安掀起了理论学习的热潮。这一时期，《新中华报》通过传达中央政策、报道学习情况、介绍学习方法等，发挥了有力的助推作用。该报在报道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学习动员大会时，刊出了毛泽东在动员大会讲话中提到的学习办法：“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深入和了解。”^④在关于青年干部学院新学制开学礼的报道中，大幅刊载了张闻天关于学习方向的讲演词，指出革命青年应“学习多方面，从多方面学习”，遵守“理论联系实际、由具体到抽象、按部就班”的学习方法，秉承“埋头、顽强而又刻苦”的学习精神，^⑤十分具有指导意义。此外，该报还大量报道了政府机关、军队、高校以及社会团体的学习情况，充分带动了全党同志的学习热情，推动了理论学习持续走深、走实。

（二）积极开展理论斗争，推动新民主主义理论建构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的显著特征。结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与非无产阶级进行思想交锋和理论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必由路径。正如毛泽东所说：“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⑥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我们党也在理论上与反共势力展开了斗争，1939年前后兴起的“三民主义之争”就是一个典型。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革命理论和政治纲领，也是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汪精卫集团和蒋介石集团在分化以后，根据各自的政治需要对三民主义进行了不同诠释，但都力图使共产主义服膺并消弭于其中，由此引发了两党论战。《新中华报》作为党之喉舌，以强烈的责任担当和阵地意识，及时准确地阐明党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在打击反共谬论的同时推动了新民主

① 《李大钊同志殉难十四周年纪念特刊》，《新中华报》1941年4月27日。

② 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新中华报》1939年9月19日。

③ 艾思奇：《五四文化运动在今日的意义》，《新中华报》1939年4月28日。

④ 《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学习动员大会》，《新中华报》1939年5月26日。

⑤ 《青干举行新学制开学礼 洛甫同志指示学习方向》，《新中华报》1941年1月31日。

⑥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页。

义理论体系的建构。

首先，以“用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宣传策略辨明“真假三民主义”。1939年3月，国民党公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意在打着“团结抗日”和“独尊三民主义”的旗号，“摒绝”共产主义、限制共产党活动。为利用这一合法宣传机会，《新中华报》首先指出“国民精神动员的目的，是为着抗日建国之成功，而不应该成为对内‘防共’和分裂的借口”，^①表示愿意号召全党积极拥护国民精神总动员。接着以日寇、汉奸、汪派、托派为直接对象，向全党同志宣告“必须广泛的动员全国同胞，切切实实的实行三民主义，揭穿汉奸汪精卫辈的假三民主义，为具体实施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真三民主义而斗争”，^②首次提出“真假三民主义”，并在5月10日刊发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一文中对“真三民主义”作了具体阐释，即“打倒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帮助老百姓、唤起老百姓、给老百姓以民主权利的民权主义，老百姓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的民生主义”。^③这一观点在社论《反对汪精卫的假三民主义》中得到进一步强化。该社论指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真正的三民主义者，乃抗战及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战友”，^④并号召全体国民坚决反对汪精卫等卖国投降的假三民主义。如此，我们党便把国民党企图捆住我之手脚的国民精神总动员活动，转化为揭露反共阴谋、表达政治观点的有利机会。

其次，以“破立并举”的理论争锋辨明“新旧三民主义”。1939年5月，蒋介石发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宣称三民主义较之于共产主义，“能涵盖一切，把各方面皆行均衡顾到，无丝毫偏颇之弊”，且三民主义只有依靠国民党专政才能实现，公然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叶青等反共理论家纷纷应声，借宣传三民主义之名攻击共产主义。^⑤为驳斥这些谬论，《新中华报》通过王稼祥和黎平的专论，逐一揭露了“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取消边区”“取消共产党在民众运动中的工作”“取消共产主义”口号中的反共阴谋，并刊发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的演说，声讨汪精卫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假借统一之名行一党专制之实的恶劣行径。^⑥为廓清理论迷雾，继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明确提出“新旧三民主义”后，该报又在1940年1月刊发了《毛泽东同志讲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⑦（后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发表于《解放》杂志），深入辨析了“新旧三民主义”，表示只有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释的新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本党才称之为“今日之必需”，才宣布“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且“新三民主义”仅与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基本相同，在其他方面均不同。如此，便在坚守共产主义阵地的同时，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

最后，在“秉承和超越”的过程中建构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一时期，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压力使中国共产党在辨析“真假”和“新旧”三民主义的过程中开始深入思考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和中国前途，推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践积累的基础上建构独立的革命话语体系。1939年5月，《新中华报》报道了“延安各界青年万余人举行纪念五四廿周年 庆祝首届青年节大会”，毛泽东在大会所作报告中初步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主体、骨干、性质和目的。这些观点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得以深化，并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提法；《新民主主义论》则进而全面阐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领导权、动力和前途等内容，并在辨析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异同时，区分了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明确了现阶段要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

① 《国民精神总动员》，《新中华报》1939年4月25日。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党同志书》，《新中华报》1939年4月28日。

③ 《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

④ 《反对汪精卫的假三民主义》，《新中华报》1939年9月15日。

⑤ 参见顾海良、丁俊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9页。

⑥ 毛泽东：《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新中华报》1940年2月3日。

⑦ 《毛泽东同志讲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中华报》1940年1月20日。

化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即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深刻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坚定了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可以说，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党在合理秉承并超越三民主义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具体分析中国实际的理论创新，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在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新中华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加强实践和理论的互动，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向性和与时俱进的鲜明品格，马克思恩格斯就是在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认识一般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根据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特点和无产阶级运动状况，不断提出新的理论观点以提供有针对性的理论指导，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因此，用理论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提升理论是理论创新发展的动态过程，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双重向度，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内涵所在，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和“具体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相应地，包括《新中华报》在内的各地各级党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有的放矢”为原则引导理论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二是以“提炼推广”为原则强化具体实践经验的宣传推介。

第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同盟军理论，形成于发动、组织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并在相关路线方针政策一体完善的过程中不断深化，以“抗战、团结、进步”为政治方向的《新中华报》在其中发挥了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深入阐发政治主张，及时纠正错误倾向。在抗日战争爆发三周年之际，《新中华报》刊发了毛泽东的《团结到底》一文，^①指出在“国难日深、世界形势大变”的情况下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决反对“左”倾和右倾错误，并在政权、军队、财政等问题上抓好政策落实。后又在社论中细致批判了党内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发生的“左”右倾错误的种种表现，以革除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障碍。^②二是有效保障配套政策实施。通过刊发林伯渠在区县长联席会议上的报告提要，全面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政策问题，系统回答了“政策是由什么来决定的，统一战线各种政策是怎样的，怎样来把握正确的政策”，^③并结合实际阐释了政策落实的必要性和具体内容，这对于建立与抗日需要相符合的政权形式有直接推动作用。三是坚决打击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流血事件，及时刊发多篇强有力的社论时评，揭露真相，进行驳斥，并争取支持。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发生后，《新中华报》采用大幅版面，以社论、评论、消息、杂文等多种形式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舆论反击战。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与谈话》以及共产党七参政员拒不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函均在该报刊发，宣传贯彻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政策方针，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捍卫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二，《新中华报》作为党的喉舌，在推进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具体实践中促进了党的建设理论的完善。在思想建设上，针对党内存在的贪污现象、资本主义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该报通过“党内批评”专栏文章进行了具体罗列和辛辣点评，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改进举措，促使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思想斗争必须处理好党的团结和党内斗争问题，为了用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斗争武器，该报通过高自立的专论揭露党内违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错误倾向，为“即不是高枕而卧，至少也是躺在‘模范’椅上打瞌睡”^④的同志敲了警钟。在组织建设上，该报刊文就党内不执行或没有严格执行决议的现象提出批评，指出“打了主意，不实行，好主意等于没主意，领导者等于没领导”，强调“从实际工作中证明决议的正确，同时使全部决

① 毛泽东：《团结到底》，《新中华报》1940年7月5日。

② 《纠正统一战线中的“左”右倾错误》，《新中华报》1940年8月13日。

③ 林伯渠：《把握统一战线的政策》，《新中华报》1941年3月2日。

④ 高自立：《论批评与自我批评》，《新中华报》1940年8月27日。

议变成具体实际”，^①强化了民主集中制在具体实施层面的贯彻执行。此外，为了切实提升领导干部工作水平，该报刊发了多篇指导性专论，提出“研究理论，研究党的政策，研究当前革命运动的实际情况”^②是革命领导同志最实际不过的任务，号召全党将“具体领导”^③作为马列主义领导者的基本要求。

第三，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从经验形态向理论形态的转化，在抗日战争和边区建设的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观的有机统一，打通了共产主义文化理想与文化建设经验的逻辑关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后，“民族化”成为考量文化发展的基本范畴，而探讨何以利用民族形式推动文化发展成为《新中华报》“新生”栏目的重要内容。柯仲平在杂文中以戏剧、电影和诗歌为例，生动阐明“中国气派”就是民族性保留并发展于百姓生活，想法使用和创造“中国气派”才能厚植文化根基、为百姓喜闻乐见。^④刘白羽和莎寨的专论则批判了文艺工作中从表象上利用旧形式的形式主义问题，强调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旧”里发展出来“新”的东西。^⑤该报还见证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形成的标志——边区文协大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对连续9日的会议内容进行了全面报道，发表了大会宣言和决议，刊发了毛泽东的讲演名篇《新民主主义论》和张闻天、吴玉章及艾思奇等同志的讲话，从历史渊源、现实背景、理论根据、边区实践成效、重点问题和发展任务等方面对文化工作进行全面论述，号召文化界为创造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为创造广大民众需要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而斗争，从而为新民主主义文化从经验走向理论提供了重要支撑。

三、《新中华报》推动党的理论建设的当代启示

历史分析更重要的意义是从中获得思想上的启迪，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更好地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更好地推向前进。^⑥通过分析《新中华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推动党的理论建设的方法、路径和效果，有利于深入把握党的报刊建设特点、宣传工作经验、理论建设规律，以及三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对新时代统筹推进主流媒体建设、党的理论建设以及宣传思想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强起来要在理论建设上下功夫

结合《新中华报》改组后的办报历程来看，正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命题首次提出的背景下进行改组，才为其宣传实践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以及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因此该报在办报理念、内容设置和发行活动中十分注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和高级干部作为该报的重要作者群，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研究和阐释，为该报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供给，使其作为党之喉舌能够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该报作为我们党与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就“三民主义”开展理论斗争的重要阵地，在强有力的批驳中辨明了“真假三民主义”和“新旧三民主义”，进而推动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建构，形成了我们党独立的革命话语体系，逐步掌握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话语权，成为指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以确有实效的宣传工作彰显了中央党报的吸引力、引领力和影响力，不负毛泽东在改

① 《反对不执行党的决议 必须按照决议检查工作》，《新中华报》1940年9月22日。

② 李卓然：《提高领导工作的研究性》，《新中华报》1941年1月12日。

③ 陆正人：《论具体领导》，《新中华报》1941年3月23日。

④ 柯仲平：《谈“中国气派”》，《新中华报》1939年2月7日。

⑤ 莎寨：《利用旧形式》，《新中华报》1939年2月28日。

⑥ 参见金民卿：《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60页。

组之初“把新中华报造成抗战的一支生力军”^①的嘱托。因此，宣传的实效性与理论的彻底性密切相关，开展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把握好理论建设这一前提。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思想文化多元共存，社会思潮激流涌动，宣传思想工作所面临的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任务之艰巨前所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充分发挥理论工作在宣传思想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对于我们党更好地凝魂聚力、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②因此，新形势下开展好宣传思想工作更应在理论建设上下功夫。首先，要把旗帜鲜明坚持真理、立场坚定批驳谬误作为本质要求。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真经”学精悟透用好，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弄清楚、讲明白、宣传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又要敢于并善于同社会上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作斗争，对于大是大非问题特别是政治原则问题，必须有理有据地进行辨析，理直气壮地进行批驳，坚守好党的理论阵地，维护好党的意识形态安全，从而全面落实宣传思想工作“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其次，要把研究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中之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加强相关研究阐释，才能在宣传工作中深刻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时代课题，更好地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思想和行动。最后，要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为联动部署。创新是理论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宣传思想工作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我们应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抓手，着力破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的现实难题，加快推进理论研究和创新工作，用中国理论回答中国问题，用中国话语解读中国道路，不断推出具有学理深度和思想厚度的成果，为开展好宣传思想工作提供理论支撑。^③

（二）重视和发挥主流媒体对党的理论建设的推动作用

纵观百年党史，以《新青年》《向导》《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等为典型的党中央主办报刊贯穿于党的不同历史时期，因其在政治定位、政策支持、信息供给、资源保障、作者构成、发行渠道等方面的显著优势，始终在党的宣传阵地上占据主导地位，是党的理论传播于中国民众的权威媒介和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有力引擎，也是通过收集和反馈实践检验成效来丰富和发展理论的主要端口，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化的互动中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建设。具体就《新中华报》而言，毛泽东曾在其改组一周年之际指出该报办得这样好的主要原因，“一是共产党办的，二是在民主政治下”，^④阐明了该报作为中央喉舌所具有的政治属性和独特优势。因此，能够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党发出声音的重要路径、表达主张的重要平台以及进行理论斗争的重要阵地，能够推动科学理论与研究阐释主体的结合、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以及与广大党员群众的结合，促进理论研究、传播和应用同频共振，有效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因此，做好党的理论建设需要重视和发挥主流媒体的推动作用。

当前，在技术创新和内容需求的双重驱动下，以互联网为主导的移动化、社交化、智能化传播趋势凸显，传播格局、媒体技术和舆论生态深刻变革，主流媒体面临空间挤压、人气流失、转型艰难等挑战。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主流媒体的品牌效应突出、资源联动灵活、信息渠道权威、采编流程规范等传统优势仍然显著，这有利于理论在当前纷繁复杂的舆论环境中得到科学阐释、有效传播和推广应用。因此，重视并发挥主流媒体的作用是新时代加强理论建设的重点和难点。我们应扬长避短，不断增强主流媒体的引领力，统筹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在打造理论高地的过程中重点处理好三对关系：一是处理好技术引领与内容为本的关系，既要避免“技

① 毛泽东：《把新中华报造成抗战的一支生力军》，《新中华报》1939年2月10日。

② 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局编：《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学习出版社2020年版，第18页。

③ 参见李春华：《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要在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上下功夫》，《红旗文稿》2019年第2期，第26~27页。

④ 毛泽东：《强调团结和进步》，《新中华报》1940年2月7日。

术至上”的误区，也要依托技术解决好理论传播“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以优质内容生产为根本，以先进信息技术为引领，把技术与内容巧妙融合，以理论优势赢得传播优势；二是处理好当旗手与做选手的关系，既要大力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让党的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也要在非意识形态内容宣传方面与其他传播媒体加强互动和融合，在百舸争流、百花齐放的媒体环境中为理论宣传输入动力；三是处理好立足网上与扎根网下的关系，既要顺应互联网发展大势和传播规律，不断拓展理论传播的网上阵地，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也要注重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和求证研判，围绕社会关切深化理论的研究宣传阐释，在群众的实践中检验理论的科学性，推动实践经验的总结、宣传和理论性转化。

（三）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新中华报》在其改组两周年之际，刊发社论《纪念本报新刊两周年》，指出该报“所以能在民族解放事业中成为一支有力的战斗的武器，所以能受到国内广大人士的欢迎和注意，首先是由于我党中央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①而该报之所以能在边区以外的摧残和封锁中，“冲破任何关卡，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一直渗入到全国广大下层民众中间去”，^②是由于该报“是真正代表广大人民意见的报纸，是真正忠实于民族国家人民利益的报纸”。^③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是该报的鲜明品质，也是其开展宣传实践的一贯原则。该报以党中央的政治方针为其所代表的政治方针，始终做传达中共中央政治意见的有力喉舌，系统反映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同时积极接受广大读者的意见，在农村、工厂、学校组织召开读者会，以使报纸内容更加深入下层群众，从而能够在动员、组织、团结全国人力、物力、财力支持长期抗战的工作上，成为激励民族觉醒、争取民族独立的一面定音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多次指出党性和人民性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并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④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开展好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有利于取得入脑入心入行的工作实效。结合时代要求和发展的需要，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要切实做到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需要重点把握好三个着力点。一是把传达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在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同时，及时反映和表达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行业的民心民意，促使党的主张与人民意愿相互转化，把“为党发声”和“为人民说话”结合起来。^⑤二是把服务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统一起来，一方面，要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宣传内容和表达形式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切实做到“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⑥另一方面，要有意识、讲方法地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使其以定音鼓的姿态引导舆论发展，从而营造良好的舆论生态。三是把正面引导与舆论监督统一起来，即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以内容的客观真实为前提，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同时要直面社会丑恶现象，通过针砭时弊、激浊扬清来弘扬社会正气，发挥舆论宣传在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新中华报》在其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历史时期中，始终牢记改组时的初心使命，服务于抗战大局，在巩固国共合作、唤起民众抗日、促进民族解放的宣传实践中，通过促进理论传

① 《纪念本报新刊两周年》，《新中华报》1941年2月6日。

② 《纪念本报新刊两周年》，《新中华报》1941年2月6日。

③ 《纪念本报新刊两周年》，《新中华报》1941年2月6日。

④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54页。

⑤ 参见张晓林：《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今日中国论坛》2013年第18期，第7页。

⑥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154页。

播、推动理论建构、丰富理论内涵，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统一于中国革命实践，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丰富和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在民族自卫战争的怒吼中彰显了真理的力量。正如凯丰在纪念《新中华报》改组两周年的专论中所评价的，“它在全国人民中获得了最大的同情，一切主张抗战主张团结主张民主的人士，都把这个报纸当作是他们自己的喉舌，引以为荣幸。因为这个报纸说出了一切真理”。^① 在党史的百年视域中，从《新中华报》切入，研究党的理论建设，只是为挖掘党的丰富史料、探索理论发展规律、研究党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微观视角。党报党刊作为我们党开展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载体，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与党的理论建设密切互动，贯通于党的各个历史时期，不仅是党的报刊史、宣传史、理论发展史以及党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更是我们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幼稚到成熟的一条重要演进脉络。^② 我们应准确把握史料与理论之间“根与魂”的关系，以“史论结合”的方式探寻理论发展的逻辑、历史演进的道理，本着“以史鉴今、开创未来”的主旨阐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为新征程上更好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贡献智慧力量。

（责任编辑：王维国 王华）

A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Role of the Newspaper *New China* in the CPC'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Sun Yangyang Jin Mingqing

Abstract: Afte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entered the stage of strategic stalemate, the Chinese Communists represented by Comrade Mao Zedong set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New China* which was reorganized as the official newspaper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 e., enhancing the theoretical core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realities in its efforts to do publicity for the sake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is points the way for the *New China* to engage in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i. e., to guide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with “revolutionary theories”. The newspaper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rty'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with diverse and effective forms of publicity. It made multi-dimensional efforts to facilitate the spread of theories, stimulated class struggle to strengthen theoretical building, and conducted in-depth practice to enrich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New China* was committed to the Party'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dissemination, and it unified the sinicization, modern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practice. By doing so, it helps enrich the result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the Mao Zedong Thought, thus providing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our collaborative efforts to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mainstream media, the Party'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Party's ideological publicity.

Keywords: *New China*; Party'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① 凯丰：《新中华报的两周年》，《新中华报》1941年2月6日。

② 方克：《中共中央党刊史稿》上卷，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